

中 | 华 | 经 | 典 | 名 | 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宋 论

刘韶军 译注

【上】



中华书局

中华
经典
名著
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刘韶军◎译注

宋论 上



NLIC2970898348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论/刘韶军译注. —北京:中华书局,2013.4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ISBN 978-7-101-09210-3

I. 宋… II. 刘… III. ①史评-中国-宋代②
《宋论》-译文③《宋论》-注释 IV. B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33898号

书 名 宋 论(全二册)
译 注 者 刘韶军
丛 书 名 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责任编辑 王守青 宋凤娣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3年4月北京第1版
2013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80×1230毫米 1/32
印张30½ 字数700千字

印 数 1-8000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9210-3
定 价 67.00元

前 言

《宋论》，清代学者王夫之著。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字而农，号薑斋，晚年居住在衡阳石船山，故又称“船山先生”。王夫之在明代灭亡之后隐居治学，著书多达一百余种。清晚期的重臣曾国藩极为推崇王夫之，他于同治初年（1862）在金陵刊刻《船山遗书》，使王夫之的众多著作得以汇聚流传。其主要著作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尚书引义》《读四书大全说》《老子衍》《庄子通》《思问录》《读通鉴论》《宋论》《黄书》《噩梦》《楚辞通释》《诗广传》等，《船山遗书》所收共七十种三百余卷。

《宋论》及《读通鉴论》，是《遗书》所收两种史论著作，最为著名。《宋论》定稿于1691年，这是王夫之思想最为成熟时期的著作，故书中的史论可以说是他一生思考的最后成果，值得后人重视和研究。另一方面，王夫之生活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动荡时期，他的治学一直与社会现实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所以他的学术成果中深含他对中国现实和命运的深切关心，这与清代乾嘉学派只重考据而不太关心社会现实的态度有很大不同。而且他研究学问，不是仅限一隅，而是饱读儒家经典，博涉经史子集，既精又博，这使他的学术视野更为宽广辽阔，因此他的学术思想也比一般学者更为深刻独到，故而他能够在明末清初的时代背景下成为一个著名的思想家式的学者。

古人治学素有史论一类的作品，如《左传》中的“君子曰”，已经在叙述史事的同时发表作者对于历史人物及事件的评论，后来司马迁撰述《史记》，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也都沿用“君子曰”的方式，随事发论，这成为这两部名著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另外也有不少学者撰作专门的史论著作，如唐代虞世南的《帝王略论》、宋代范祖禹的《唐鉴》、明代李贽的《史纲评要》等，都是有名的史论专著。王夫之亦继承了中国古代史学的这一优良传统，在一生治学的晚期，为后人留下两部史论《读通鉴论》三十卷和《宋论》十五卷，表达了他对中国古代通史的完整评论。这两部书完全可以看作前后相续的系列著作。因为《资治通鉴》从三家分晋写到五代后周，接下来就是宋代的兴起。学者们在《资治通鉴》之后的续作，如清代毕沅撰《续资治通鉴》，都是在时间上紧接《资治通鉴》的结束之年——后周世宗显德六年(959)，而从宋太祖称帝的建隆元年(960)年开始。所以读完《资治通鉴》再读宋代历史，正好一年不差地紧接而来，因此王夫之写完《读通鉴论》再写《宋论》，犹如已有《资治通鉴》而续作《续资治通鉴》一样，顺理成章，首尾相接，由此形成了他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完整评论。可以说这两部史论著作，正是王夫之中国史论的上下部。

王夫之的儿子王致在《薑斋公行述》中说，王夫之晚年作《读通鉴论》和《宋论》两书，目的是探讨“上下古今兴亡得失之故”。王夫之生于明朝，生于此朝就是此朝人，那种家国归属感是无法用别的东西替代的，所以他对明朝的灭亡怀有深痛感触。在这样的心理基础上读史论史，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历朝历代为什么会有盛衰兴替？在这种不断出现的无情残酷得令人心碎的过程中，究竟是因为什么人做了什么事而使这种局面发生、出现并不可逆转、不可挽救？古人早就说过“履霜坚冰至”，又说这种情况“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每个王朝从初起时的兴盛强大到灭亡时的衰弱无力，曾令多少身处其时的忠臣义士扼腕叹息而又无可奈何，更令不少怀有现实关心的学者感慨不

已！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绝不是仅靠空谈轻论就能剖析清楚的，必须追溯历史的完整过程，根据具体的人物及其作为加以细致的分析，王夫之的史论就正是沿着这条学术道路行走的，而这也正是古人史论的可贵之处，值得今人研究史学时借鉴参考。

《宋论》与《读通鉴论》一样，都是对全书的完整阅读，把所要评论的历史自始至终、原原本本地审视一过，而不是心猿意马，跳跃择取，更非未见一叶而不见泰山，论一点而不及其余。所以其书表面上看似似乎散乱无章，实际上总是贯串一个主题：这个王朝怎样由兴盛而衰弱而灭亡，把这个王朝中的帝王将相都放到这个问题前加以审视评鉴，由此发现他们的得失功过，发现王朝盛衰转变的根由。王夫之正是坚持了这一严谨忠实的治学方法，仔细阅读了宋代历史的整个过程及诸多细节，所以他在《宋论》中能够提出与众不同的分析和论点，对宋代不少人物的所作所为及其历史影响都有独到的见解，让数百年后人们读其书而深感其生命力犹在、思想性深刻，令人深受启发。

一个王朝的兴衰，总是由善恶两个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善者之善，恶者之恶，不从长远的历史进程上看，只看一时一事，是不能真正认识到它的作用的。善者是正确的措施和制度，恶者是错误的措施与制度，而这都是由特定的人来完成的。所以史论所评只能以人为中心，以事为枢纽，而根本的着眼点就在于这些人与事对这个王朝命运所起的作用。

在宋代能做出正确决策、措施从而定下良好制度法规者，在王夫之看来，宋太祖是最值得称赞的。他说太祖为后世子孙定下三条戒律，每一个新继位的皇帝，都要进殿，在刻着三条戒律的石碑前下跪拜读，这三条戒律是：保全后周皇帝柴氏的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说，有这三条，“不谓之盛德也不能”。这三条戒律的精神就是：“以忠厚养前代之子孙，以宽大养士人之正气，以节制养百姓之生理。”而要做到这三条，不用求别人，只需求自身就够了。只要自己心里相信

并遵守这三条,就能使“治德蕴于己,不期盛而积于无形,故曰不谓之盛德也不能”。有了这三条,王夫之认为宋就“轶汉、唐而几于商、周”。汉代的文、景之治,再传而止,唐代的贞观之治,及子而乱,宋太祖从建隆年间改变了五代的乱世,让人民过上了安定的生活,直到神宗熙宁时才逐渐趋向衰弱,所以说超过了汉、唐而接近商、周。他认为这不仅要靠子孙的贤明和士大夫的襄助,更要靠家法的囊括以及政教和熏陶,所以自汉光武以外,要讲帝王的美德,没有人能超过宋太祖。

太祖用三条戒律确定的基本制度,后几代帝王还能遵守,但到宋仁宗庆历年间就开始出现不少议论,到神宗熙宁时期就因为要进行变法,从而逐步舍弃了太祖求己不求人的治国精神,使太祖治国的德意逐渐泯灭。王夫之认为宋王朝的得失之枢、治乱之纽、斯民的生死之机、风俗的淳浇之原,就在这里,后来的帝王不明白这样一个至为简洁的道理,从而使宋朝的国运逐步走向衰落。

太祖的治国德意,在王夫之看来,不是因为他有多么高深的理论和学识,而是出自天意的启示。他认为太祖的儒术尚浅,又不受异学的干扰迷惑,只是害怕天命不能长久眷顾自己,又深知民众所受乱世的祸害,并鉴于外族和盗贼毒民侮士的风气,所以才提出了上述三条。在这种德意下,治国就是要视力之可行,从容地因势利导,而不是追求表面上的尧舜式的美名,更不是严刻地责求于人。正是由于这样的心态而形成了从容不迫的政治格局,就能使天下扰纷之情,在优游中就绪,瓦解之势,渐次以即安,并能延续百年,余芳未歇。王夫之总结太祖的治国之道就是三点:简、慈、俭。内心没有分歧干扰,所以行动上就会简。用简明的政治来行慈,慈就不是用小恩小惠沽取人民的感恩。用简明的政治来行俭,俭就不会引起官吏的贪吝。孔子说的“善人为邦百年,可以胜残去杀”,汉文帝、汉景帝没做到,宋太祖却差不多做到了。

王夫之如此赞赏太祖,当然并不是只是欣赏这一个人,而是总结具有普遍意义的治国之道。这种总结不是纯由思辨进行推论,而是根据

历史事实加以论证,所以就更显得有理有力。只是后人往往不明其意,而忽视了王夫之在《宋论》中所发的此类议论。

对于宋朝最恶的人和事,在王夫之看来就是赵普和秦桧。关于这二人的历史评价,人们往往赞赵普而骂秦桧,但王夫之则将二人列为宋朝最大的罪人、最大的野心家。这种分析和评论,自有他的道理,这些道理却常被众人所忽视。

王夫之认为赵普、秦桧二人的共同特点,在于都怀有很大的野心而想取宋王朝而代之,这与唐代徐世勳(即李勳)一样。他说:徐世勳杀王后立武氏,是想让武氏乱唐而由自己来夺蹊田之牛。假使徐世勳不死,他就可以操纵武氏,让愚蠢的唐中宗如同晋安帝司马德宗一样,这样就可使“唐移于徐氏矣”。而王夫之认为,“赵普亦犹是也”。赵普与太祖“誓而藏之金匱”的《约书》里规定“立长君、防僭夺”,在赵廷美、德昭死后,太宗一旦不保而赵普还活着的话,他就能“藐尔之孤”,把赵氏年幼继承人的生死操纵在自己的股掌之中。但他没有想到太祖死后,太宗以英姿居叔父之尊而继位,使赵普的奸慝不能得逞,于是他就只能姑授太宗以俟太宗之后的年幼继承人由自己来操纵。经过这样分析,王夫之下结论说:赵普的用心与徐世勳对武氏的用心是一样的。

人们对秦桧的批评,一般都是说他与金人勾结引导宋王朝只求讲和,为此而用莫须有的罪名害死了岳飞,使军事抗金中途而废,王夫之则认为秦桧的最大目的是想篡夺宋的王权。王夫之说:秦桧诛逐异己,不欲留下一个人,不只是出于一时的忿仗而求报复,他又遍置党羽在朝廷的各个要津,让宋王朝没有一个大臣可以倚靠,当时高宗年已老耄,普安郡王虽然已从疏远的支系选拔上来,但还没有正式立为太子,一旦高宗官车晏驾,秦桧还不死的话,他就会选冲幼之人暂时继位,然后再由自己起而夺之。此时外有女真为援引,内有群奸为佐命,篡夺赵氏的王权,对秦桧来说就是“易于掇芥”了。王夫之说,秦桧的这一野心,“岂待吹求而始见哉”?

能揭示出秦桧的这一种野心，确是他人没有看到的。王夫之又说明秦桧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下了很大工夫，做了不少准备工作。首先是逢迎高宗之欲，班北伐之师，解诸将之兵，而使自己独立于百僚之上，之后又将诸贤流放，害死岳飞，让韩世忠谢事闲居，使刘锜、二吴敛手听命，让张俊总领诸军的心愿不能实现，也等于被废黜了。此时的秦桧，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周回四顾，知天下无人能如己何，高宗对他也是惴惴而无法驾驭，在此情况下秦桧就敢于睥睨神器了。王夫之说这是“势之所激，鼠将变虎”，而在秦桧刚刚回到宋朝时，还“非有曹操、司马懿之心”，但发展到后来，“考之于其所行，不难为石敬瑭、刘豫之为者，岂有察之而不易知者乎”？说明王夫之是根据秦桧的所有行动从而得出这一判断的。王夫之又说明秦桧“其锐往而无定情也甚狡，其执持扼要而操以必得也甚坚，则不必久怀篡夺之心，乘乎可篡而篡焉，复何所戢而中止乎”？认为其野心逐渐形成，既是必然的，又是不收心而中止的。

王夫之观察和总结宋代的兴亡史，最痛心的一点就是宋王朝军事力量的衰弱不堪，他认为其根本原因也可以追溯到赵普身上。赵普最初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让太祖对军事将领们采取了“杯酒释兵权”的策略，赵普这样做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太祖巩固手中的皇权，在王夫之看来，赵普其实还怀有更为自私的目的，即为了巩固自己在朝中的地位而削弱军事将领的权力。王夫之说，赵普在太祖当上皇帝的时候以幕客之雄，膺元勋之宠，睥睨将士，地位在军事将领之上，但他也自知军事将领对他并非心服口服。其后军事将领平定各处的割据势力，赵普都没有参与之功，所以当时为太祖推诚戮力的功臣，皆瞧不起赵普而愤恨赵普倾轧自己，赵普与军事将领“固有不与并立之势”，于是赵普就日思夜想来削弱军事将领的地位和权力以求自安。为此他充分利用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心理，而让太祖把自己倚为社稷臣，所以王夫之说赵普根本不是出谋划策来安定赵家的天下，只是尽力折抑武臣，使他们不能建立不世之功来与自己争夺太祖的眷顾而已。王夫之因此

下结论说：“凡赵普之进谋于太祖者，皆以钳网太祖之故旧元勋而敛权于己也。”

更恶劣的是在赵普的推波助澜下，宋太祖对军事将领的猜疑之心竟然在整个宋代形成了一种治国的“家法”：“以普忤害之小慧，而宋奉之为家法，上下师师，壹于猜忌。”赵氏治国的这种“家法”，并不是成文的制度，而是一种埋藏在宋代各个帝王心中的深深隐忧，王夫之说这是宋代各届帝王的“不言之隐”。而这种“不言之隐”，就导致了宋代历届帝王不信任军事将领从而使宋王朝的军事力量越来越弱，成了北方民族不断欺侮、侵入最终使宋王朝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王夫之身处明亡之后，重新反思这种治国家法对于中国的深远影响：“宋之君臣匿情自困，而貽六百年衣冠之祸，唯此而已矣。”后人往往称赞宋朝对文人的优遇，王夫之却认为这种重视文化的表面光鲜的背后却存在着不信任军事将领的隐而不宣的心情，受此心情的困扰，宋朝军事积弱，不能对抗外族的军事入侵而亡，明朝也走了同一条亡国之路，所以王夫之说宋对军事将领的猜疑削弱的危害不仅仅是宋王朝灭亡，而是“貽六百年衣冠之祸”。从宋王朝建立的960年算起，到明王朝灭于清的1644年止，正是六百多年。不同的王朝，同样的结局，这说明国家的军事力量不强，民族和文化的生存都将受到重大破坏乃至灭亡，所以这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而是衣冠（即民族文化）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只重文化，不重军事，文化也将不保而受惨重的灾祸，王夫之的沉痛感慨，我们在四百年后仍应有所体会。

王夫之在《宋论》结尾处又为这个问题发出感叹，他认为：军事力量的软弱，导致整个国家的软弱，从而屡受外族的欺侮，其严重性还不仅仅是一两个王朝的灭亡，而是“裂天维、倾地纪、乱人群、貽无穷之祸”，“自轩辕迄夏后以力挽天纲者，靡散于百年之内”。中华民族从黄帝以来力挽天纲的天维地纪就在宋代最后的一百年之内靡散殆尽，由此而使中华民族一直处于屡受外族侵略欺凌的困局之中。王夫之只看到了

从宋到明的积弱而亡,他不可能看到清朝晚期的中国,同样是积弱而受欺侮,这表明王夫之所揭示的中华民族的生存问题并没有真正解决。清朝虽然靠武力征服了明王朝,统治了天下,但最后还是走上与宋明一样的积弱之路,王夫之关于宋代积弱而亡的深思,被历史再次证明,可惜人们似乎没有注意王夫之揭示的这一问题,并继续深刻反思,从而找到一条使中华民族强大到不受外来势力随意欺侮的道路。今天重读《宋论》,对王夫之的这一认识,不能不特别关注和深思。

《宋论》关于宋代历史的评论中还有不少精彩的见解,读者仔细阅读全书,自会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在此就不赘述了。

王夫之撰写《宋论》,是按宋代帝王在位的先后顺序分别论述,一帝一卷,只是最后的度宗、恭宗、端宗及祥兴帝因时间太短而合为一卷,整部著作并非按专题进行论述,而这正是古代史论著作的一种通例,《读通鉴论》也采用了这种方式。这种形式的好处是顺着历史进程的顺序,随着历史过程中人们的言行而展开作者的评论,也使读者按照历史的进程来了解历史的发展变化,听取作者评论。这样就使史与论有机地结合,让读者更完整地了解宋代历史发展演变的源流以及其中的得失。这种史论方式与现代通常采取的专题论述方式有所不同,读者应有所注意。

《宋论》在1962年已由舒士彦先生点校整理,1964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舒氏整理点校时依据同治四年(1865)曾氏金陵刊刻的《船山遗书》本,参考了马宗霍先生的校记。马氏的校记,是用衡阳刘氏、邵阳曾氏所藏《船山遗书》抄本若干种与金陵刻本对校后形成的记录。舒氏在整理点校时没有完全照录马氏的校记,他的原则是刻本有空格而抄本不空者,就据抄本补足,而刻本有改窜处,则细审文义后认为抄本确实胜于刻本者才据以订正,而他认为抄本不如刻本者则不改。在舒氏点校后,中华书局又请王孝鱼、童第德审阅,王孝鱼在舒氏分段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调整,并从校勘的角度提出了一些意见。中华书局根据这些

意见,在出版时加上若干条编者按语,又对抄本和刻本中文义可以两通的文字异同处补上校记,还参考了周调阳、刘毓崧等人的校勘记,比较全面而慎重地进行了全书的校勘,保留了前人的校勘成果。这次注释时就以中华书局的舒士彦整理本为底本,此外参考了岳麓书社1996年出版的《船山全书》第十一册中的《宋论》。

《船山全书》中的《宋论》,在整理时以中华书局舒士彦点校本为基础,又参考其他各本。舒士彦点校时参考了马宗霍校记,但未全部收录马氏校记,马校共455条,舒氏引用不到一半,《船山全书》本则把马氏校记全部补足。此外又对照所能搜集到的各种抄本和校勘记,对全书原文加以补校,恢复了金陵刻本中因为隐讳而不刻的字八十多处,其他删改一百九十多处,增补脱文五十多字,删去衍文二十多字,乙转倒文二处,订正错简一处,其他异文六十余处一百九十多字,也都存录以备参考。这些校勘成果,在这次注释翻译时尽量加以参考,有所改动,就在注释中加以说明。《船山全书》本又为各卷中的各条拟了标题,中华书局本没有此类小标题,此次注释翻译时仍按中华书局本的格式,不另加标题,以求符合原书旧貌。

中华书局出版时对文字讹误加以改正,用加圆括号的方式表示这是刻本的原字,用加方括号的方式表示是据校勘订正的字。这次注释翻译时,直接采用订正之后的字,不再保留未改之前的字,相关的校记,也没有保留。中华书局也有个别的错字,如72页最后一行“石藏于土”,“土”字误为“士”。像这种情况,就在注释翻译中直接加以改正了,也不出校记。

此外还有中华书局本及《船山全书》整理本都没有发现的文字错误。如宋仁宗第五条第一段说仁宗之生以大中祥符三年庚申,及嘉祐二年乙酉,二十有六年;经过核对,发现如果作嘉祐二年,距大中祥符三年就有四十七年,应该作景祐二年,才符合二十六年之数。又如仁宗第十四条内论到韩、富二公的关系时有一句“嫌御自此开矣”,“御”字今天

作“却”，“嫌却”不能成词，当是“嫌郤”，“郤”通“隙”，“嫌隙”指二人之间出现隔阂。中华书局整理本和《船山全书》整理本对此字都没有出校，因为版本上没有异文，而注释时据理校法就发现作“郤”字是错误的，这其实是因为“郤”与“郤”字形相近而易误。这类文字错误，只校对不同版本都难以发现，只有在注释翻译时仔细核对史实和体会文义，才能看出其中的错误。

注释翻译时，对舒士彦点校时所加的标点符号也有所改动。如太祖第七条：“而窦建德、萧铣，徐圆朗乘之以掠杀既困之民”，“萧铣”下不应用逗号，而应该用顿号。太祖第八条：“赵普受吴、越之金”，标点本“吴”字下加顿号，则吴与越似为二国，实际上此处的“吴越”指钱镠所建吴越国，吴越二字之间不当加顿号。太祖第八条：“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曹彬、潘美等任之，而普弗与”，下江南，收西川，平两粤，是并列的事情，所以“南”“川”下的逗号都可改作顿号。凡是标点符号的改动，因为并不影响文义的理解，所以都不特别加以说明。

中华书局本对《宋论》全书做了分段，这次注释翻译沿用这种分段。每段先出原文，再出注释，最后出译文。注释的重点是人名、地名、相关制度、史实以及个别生僻字的读音和释义，还有书中引用古代典籍语句的出处及其内容的解释。

书中的文字，均按原本来写，如孟昶的“昶”，一般因为昶字不常见而改作“咏”，中华书局本仍作“昶”。这一类的字都严格遵照中华书局本而不改动。还有一些属于异体字，如“柰”，可以直接改为“奈”。也有些字属于通假字，则不能改，如“繇”通“由”，不能改为“由”。

在翻译中，尽量按照原文的字句进行直译，但古人行文中总有不少省略，这与现代汉语的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所以完全采用直译的方法，有时不便于理解文意，所以在翻译时有时要把原文省略的内容适当加以补充，才能使读者易于理解。

王夫之的学问广博精深，文笔深奥，文脉与思路的跳跃性较强，他

在《宋论》中所发的议论,有时难以理解。注释翻译过程中,尽量根据前后文揣摩文意,以求忠实表达王夫之所要表达的思想。但限于注译者的水平,有些地方可能会有误差,敬请读者在阅读发现问题后,有以教我。

注译者

2012年4月

目 录

上册

前 言	1
卷一 太祖	1
卷二 太宗	114
卷三 真宗	210
卷四 仁宗	292
卷五 英宗	410
卷六 神宗	430

下册

卷七 哲宗	499
卷八 徽宗	533
卷九 钦宗	582
卷十 高宗	612
卷十一 孝宗	738
卷十二 光宗	775
卷十三 宁宗	810

卷十四	理宗	861
卷十五	度宗	926
	恭宗、端宗、祥兴帝	933

卷一 太祖

【题解】

宋太祖赵匡胤(927—976)是宋王朝的开创者,涿州(今河北涿州)人。出身军人家庭,先在后汉枢密使郭威手下为将,屡立战功。郭威建立后周王朝,赵匡胤官至殿前都点检。960年,他让人谎称契丹联合北汉南侵,领兵出征,行至陈桥驿,夜里发生兵变,黄袍加身,返回京城称帝,建立宋朝,976年去世,在位时间16年。

王夫之对太祖的评论,内容丰富,涉及诸多方面。赵匡胤本是五代后周的殿前都点检,当后周世宗柴荣英年早逝,他的儿子仅有七岁就匆忙即位,人心不稳,赵匡胤在此背景下以陈桥兵变形式黄袍加身,取代了后周小皇帝,建立了宋王朝。陈桥兵变时,一些人用天命说来造舆论,因此王夫之开篇就论述统一天下与天命的关系,认为统一天下不是仅靠天命。赵匡胤称帝后为后世继位者立下三条诫令:保全后周的柴氏子孙、不杀士大夫、不加农田之赋,王夫之认为这三条诫令表明赵匡胤具有“盛德”,赵匡胤又对降伏之主采取优遇政策,王夫之称之为“忠厚”。在士人与君主的关系上,王夫之针对五代以来士风败坏的情况,强调士人应该自责,使太祖不能把他们看得低贱而有护惜之情,否则不会得到帝王的尊重。君主要重士、得士,大臣、师儒、长吏也要重士,为君主选用士人,这都关系到王朝的稳固。对于太祖的徽服